**鲁迅的童年经验与其小说创作中的深层叙事结构**

徐顽强第17卷第6期天中学刊2002年12月

摘要：鲁迅早期生活的压抑感及其记忆，构成了其童年经验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内容。这种过于压抑的童年经验不仅仅影响了鲁迅特定的创作心态与作品中的情绪基调，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其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以及深层叙事结构。

关键词：鲁迅；小说创作；童年经验；叙事结构

Abstract:Depression was an important and distinct content in the life of LU Xun’s childhood.The experience ofexcessive depression in his early life not only influenced his special mood in the creation and the keynote of feeling in his works,but also the draw of materials and the ideal and the deep structure of narration in his creation of novels.

Key words:Lu xun;creation of novel;childhood experience;structure of narration

中图分类号：I210.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261(2002)06-0051(03)

一

与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一样，鲁迅是说不尽的。面对鲁迅的小说作品，就像面对着一块融铸着多种优良成分的合金，你不能不被其中那种质感极强的黑色基调所吸引。那种基调在人们心理上所引起的感觉往往是沉郁的、压抑的，也是坚实、明澈、富于爆破力与穿透力的。可以这么说，鲁迅的小说作品存在着一种情绪上的连贯性，仿佛它们全都随着同一股水流在移动。作为读者，我们常常不能自己地受着这种忧郁的寂寞的水流的浸润和带动，渐渐沉入到鲁迅的小说世界里。这是一个弥漫着浓烈的悲剧气息的世界，聚集着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压迫、病痛和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苦闷悲哀。在这个世界里，季节往往是严冬寒秋，天气总是阴沉凄冷，时辰总在黄昏夜半，景色常常枯索苍凉；而人物，不是形容枯槁，日见颓唐，便是每况愈下，穷苦潦倒，默默地走向死路。

鲁迅小说作品中这种浓烈的悲剧气息是与其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关切密不可分的。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曾经说他是“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1](P1427)。实际上，鲁迅写的最多的也是最为成功的还是“下层社会的不幸”，还是各种各样的悲剧。这些不幸不仅涉及到贫困、疾病和欺凌，而且最多的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它包括了多种多样不幸的死亡。这里有不幸的夭折和自杀，悲惨的被杀和倒路而死，幼儿的病故和野兽的吞噬；这里有死亡的仪式与生者的哀痛。这一切，归根结底，是鲁迅童年经验对他创作心理的影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叙事中起作用的更基本的力量是心理力量，是童年心理的发展决定着什么故事被讲述，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力量使然。

在探讨人的无意识方面卓有成效的精神分析学派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童年经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童年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心理倾向和特点的形成是至为关键的。一个人在童年时对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体验，多半会影响他成长后的政治观点、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等。对于作家，则会影响到他对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定向，直至本人创作风格的形成。

二

童年经验或早期经验，首先无疑主要是对家庭和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生活的印象与经验。对于鲁迅而言，基本上是在一种被压抑的和沉重的氛围中度过他的最重要的一段童年时光的。在鲁迅的童年经验中有着他的对于不愉快的和压抑的早期生活的极为敏感的记忆，或者说，早期生活的压抑感及其记忆，构成了鲁迅童年经验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内容。就像人们已经熟知的，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福清一家的最大的灾难和厄运，就是1893年，周家的家长介孚公因犯“科场案”遭捕入狱，并被判“斩监候”。这无疑使正家道败落的周家又遭釜底抽薪之灾，自此更加一蹶不振。这时，鲁迅仅十二、三岁，正值天真无忧的少年时光。在此之前，鲁迅也有过快乐的童年生活。但是，祖父的入狱却结束了这一切，并以此彻底改变了鲁迅今后生活的色彩和走向。他不仅被讥为“乞食者”，而且此后不久，父亲又突发急症，两三年即告谢世。在这段时期中，鲁迅作为长子长孙不得不过早地分担起家庭的重负，在世人的冷眼中受尽了“侮蔑”和炎凉，遭到和忍受了种种难堪、屈辱、自卑和压抑。如果说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逝使他幼嫩的心灵曾为家庭的不幸而感到悲伤，那么，被称为“乞食者”的轻蔑和长辈亲朋的倾轧以及乡邻的流言，还有那药房与当铺间的连年奔走，则使他过早地尝遍了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人生酸苦。这一切，他在其后的《呐喊?自序》等作品中曾有过一些反映。鲁迅对人生的印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2]（P91）显而易见，鲁迅对这一段早期生活的经验，记忆是极为深刻的，他以后多次由此而提及自己的出身、家庭和早期生活。

但是，对鲁迅少年心灵的影响又何止是这种世态的炎凉。弥漫在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周围的封建传统意识氛围，几乎在他童蒙未开之时，就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巨网，企图把他永远地禁锢并扼杀在其中。鲁迅是怀着一种受到伤害的心情走向人生、社会的。在对人世的感慨和洞观的背后，不知隐藏了他多少滞重的记忆。

如果说上述经历使得鲁迅对旧的社会与旧的人生方式感到彻底绝望与憎恶并最终决定他成为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的话，那么他的大姑母的惨死、小姑母的早逝以及他的继祖母与母亲等人的不幸命运，则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隐痛与沧桑之感，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进入了对人生的形而上的思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极其重视群体价值和血缘关系的文化环境中，任何一个亲人的不幸与离世都会给其他亲人带来极深的刺激与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感触直至探索。

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我们发现了鲁迅在中西、新旧两种文化观念冲突下内心的矛盾与无奈。特别是在他童年经验的另一部分，当他看清了聚族而居的周氏家庭那种纠缠、复杂的关系、那种令人伤怀的“窝里斗”与不安宁之后，除了与之“决绝”、“逃到异地之外，实无更好的选择。但逃避毕竟不等于解决，当鲁迅数年后在创作中重新面对它们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感到“无法排遣的悲哀”与无法解决的“懊恼”、“无聊”。正是这种童年经验影响了他创作中那种一以贯之的情绪潜流。他虽然对旧的社会、旧的人生在理智上充满了憎恶与绝望，但他在情感深处，在潜意识中却不能甚至不愿像别人那样慷慨激昂甚至兴高采烈地埋葬它，因为那社会、那人生里毕竟有着他的一份血和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竭力张扬个性的鲁迅身上不仅仅看到他的敏感与决绝，同时也体会到了那种无可奈何的、难以彻底解脱的“寂寞”、“无聊”乃至“孤独”。所以我们说，鲁迅的“孤独”决不仅仅是“前行者”的孤独，它更是一种徘徊于“明暗之间”，对人生无法做出圆满调和与拯救的“影”的忿闷与孤独。正如蒂利希所说的那样：“绝望的痛苦是这样一种痛苦：由于非存在的力量，存在者知道无力肯定自己。”[3]（P50）这一点在其创作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鲁迅的童年经验不仅仅影响了他的特定的创作心态与作品中的情绪基调，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已经有许多论者明确指出，鲁迅叙事作品中的大部分人物及故事与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生活都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三

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鲁迅的童年经验与其小说创作中的深层叙事结构的关系。所谓深层叙事结构，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一种单一的、能够阐明不同的表层结构的意义模式，它实质上是一个作家深层的知觉结构，是作家人生观或世界观的基本结构。它常常规定着我们对于经验的感知与反应、评论与表现。换句话说，任何一位作家创作的深层叙事结构实质上都对应着他个人对经验、人生的独特知觉结构。这种联系着“更为普遍的有关生活、社会和宇宙的概念”的知觉结构，它的雏型与基本支架实际上与一个人的早年生活经验（包括青少年时期）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关系。这种宏大与复杂的结构直接影响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深度与广度，也潜在地制约着一个作家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一点在鲁迅的创作与生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过的那样，鲁迅的小说创作是弥漫着极其浓重的悲剧气息的，这种悲剧气息的发生是与鲁迅童年所经验的无数悲剧事件分不开的。在鲁迅的人格与心理发生与发展的最关键的十多年里，家庭一直是变故迭起，厄运不断，似乎人世间所有的悲剧都集中在鲁迅的面前，让他不能不看，不能不记，纵使多年之后也“不能全忘却”。不仅如此，更使他倍感悲凉的是，在他留学日本期间，从幻灯中看到的中国人的麻木冷漠以及创办《新生》的失败都给他深深的刺激与失望，加重了他的寂寞与悲哀,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正像鲁迅自剖的那样：“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后来也亲历或尝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2]（P92）由此可以看出，寂寞感、孤独感以至于对人生的无聊感，是鲁迅童年经验以及青少年经验所留给他的最深刻最主要的心态与情绪，这也是他把整个社会与人生看作一个“铁屋子”的必然原因，是鲁迅个人对于过去与现在的绝望的根本所在，是他把希望寄托于“孩子”与“将来”的深刻缘由。正如他所说，“希望是在于将来”，而在他则是“我之必无”，尽管在别人那里“他之所谓可有”。鲁迅之所以感到即使是创作与回忆也无“意味”但却还是要创作，用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看来，不能不归因于他早年的经验在他心理上所造成的“压抑”过重而不得不将之“升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深刻剖析道：“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2](P91)“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2](P92)总的来说，鲁迅即使在写作《呐喊》与《彷徨》之时，那种对人生的寂寞感、无聊感和痛苦感也是毫无改变的。这种对人生的深刻悲剧感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必然都是悲剧人物，且有着必然的不幸命运与悲剧结局。因为在鲁迅看来，这整个人生与社会就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2]（P92）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和社会观，鲁迅创作前期的小说作品中写了两类悲剧：一类是父辈的悲剧，也就是“昏睡者”的悲剧，或者叫做“日常几乎无事的悲剧”；另一类就是子辈的悲剧，也就是“较为清醒者”的悲剧，“不幸的少数者”的悲剧，或者说是“孤独者”的悲剧，他们的悲剧更深更痛。正是在前一类悲剧里，鲁迅反映出了“中国大众的灵魂”[1]（P895）。在这里，他写了死于科举梦的孔乙己、陈士成，写了在恶梦中沉默的华老栓与闰土和偶尔唱了两声而终至死去的阿Q，更写了在铁屋子中挣扎着而终于窒息的祥林嫂。而在第二类悲剧里，鲁迅则写了在铁屋子中呐喊的狂人与夏瑜，了撞了一圈铁屋子而又终于昏死的吕纬甫、魏连殳、子君以及并未放弃希望的涓生等。

很明显，这些悲剧起码在表层结构上是绝不相同的。但细心的读者进一步也许会发现，无论是第一类人物还是第二类人物，无论是他们的死亡或者不幸，都很难找到具体的凶手与负责者。除了《阿Q正传》，其他作品中并没有假洋鬼子与赵白眼，悲剧人物周围的具体的人似乎都有罪，但似乎又都没罪（即使按照法律），正像《狂人日记》里的大哥、陈老五和赵贵翁们一样，他们谁都没有吃过人，但似乎又都吃了人。即如孔乙己，直接毒打他的只有丁举人，但他并不是丁举人最后打死的；祥林嫂也是这样，你不能斩钉截铁地断言她的死应该由婆婆或鲁四老爷负责。至于魏连殳，他直接的死因是痨病……但他们又的确是间接地死于周围人的精神虐杀里，而且这虐杀大都伴随着一定的物质压迫。实际上，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故乡》、《阿Q正传》、《白光》、《祝福》、《在酒楼上》、《长明灯》、《示众》、《孤独者》、《伤逝》和《离婚》这十多篇故事后面，我们其实听到的只是同一个故事：群体对个体的嘲冷、侮蔑、挤压与虐杀。这个群体作为对手，又是无形的或是不确定的，这正像一个武林高手陷于八卦大阵一样，周围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对手，但又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你最后的死负完全的责任。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消耗、分散你的体力、精力、心神与武功，但你决说不出你究竟死于谁人之手，你只能无限憾恨地说你是死于“阵”而非死于个人。这个“阵”在鲁迅的小说中就是愚昧麻木而又冷漠无情的“闲人”“看客”、自私狠毒怯弱狡猾的“举人”“老爷”等，或者说就是那本性“吃人”的反动文化。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2]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3][美]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